

达成政治共识的障碍与突破路径

郭士民 蒋 锐

摘要: 政治共识的达成是开展国际合作、化解地区矛盾冲突、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当前,社会分化带来不同政治主体思想观念多元化、政治理想差异、政治事实认定差异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共识的顺利达成。当代中国政治共识的达成,需要积极寻找和确认政治共识达成的主体,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善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因素,利用好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两个主渠道,并应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关键词: 政治共识;政治理想;政治事实;价值;程序

政治共识是指在一定时代,生活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政治信念、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规范准则^①,它包括价值和程序两个层面的内容^②。价值性政治共识是指为了开展共同政治行动而建立的政治价值观念,带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特点;程序性政治共识其指政治共同体内的人们对共同的政治活动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共同认可,表现为制度、法律法规、行为规范等。本文拟在分析政治共识达成当代意义的基础上,就达成政治共识的障碍因素及其达成路径略述管见。

一、政治共识达成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政治共识的达成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上和一国内部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能否构建稳定的政治共识达成机制,影响到国际和平稳定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政治共识的达成是开展国际合作、化解地区矛盾冲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基础。一方面,达成政治共识,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在价值层面的“为什么合作”和程序层面的“如何合作”两方面达成政治共识,才能顺利开展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达成政治共识是化解地区矛盾冲突的必要前提。任何矛盾或冲突的发生,意味着相互间存在着差异或矛盾。为了避免矛盾升级,甚至矛盾激化,需要各方先承认彼此存在差异和矛盾,这样才有对话的可能,进而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甚至开展合作。再一方面,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需要积极达成政治共识来予以保障。例如,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因为威胁时刻存在,所以不但要求同存异,而且要聚同化异,要主动开展沟通协商,积极寻求达成政治共识。

收稿日期:2017-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09&ZD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14JJD810016)、山东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研究”(16CTZJ04)。

作者简介:郭士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济南 250100; gs505@qq.com);蒋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jiangrui@sdu.edu.cn)。

①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② 不同学者之间对于政治共识的基本内涵界定大同小异,但对于其内部结构,有的将其分为价值、程序和政策三部分,如美国学者萨托利,参见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有的将其只界定为价值和程序两部分。参见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当前国内学界赞同二分法者居多,本文也赞同二分法。

其次,达成政治共识能够促进中国的社会稳定。一方面,它能够防止利益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增长能够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也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①。当前中国出现部分群体相对剥夺感加重,以及一些人消极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②,这些社会情绪容易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消极影响。为了使得公众的利益诉求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迫切需要回应社会利益关切,达成政治共识,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它能够凝聚社会层面价值共识以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使得不同群体之间观念冲突复杂多样,如新旧观念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汇流、进步与落后等观念的持续较量^③,面对这种情势,迫切需要达成政治共识,以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促进社会发展。

再次,政治共识的达成可以助力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一,它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开展平等理性的政治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通过平等协商来推动合作。正如费孝通针对政治协商会议评价时所指出的:“中国因为各党各派有一致的目的。领导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它的决策要从群众中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众路线。现在中国社会上已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各种不同意见只要大家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摆事实、讲道理,认识就可以一致”^④。政治协商的过程也是达成政治共识的过程,在沟通协商过程中调动各政治主体的积极性,营造和谐包容、平等协商的氛围,从而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第二,它有助于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现代治理需要共同体成员提高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达成政治共识有助于全民的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得到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在达成价值性政治共识的过程中,可以促使社会的道德体系同法律规范相适应;在达成程序性政治共识过程中,可以促使将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纳入到法律程序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之中。总之,政治共识的达成有助于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从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有助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作为价值取向,把构建公民、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型政府作为目标^⑤。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公共管理从“单向管理”为主向政府、社会、群众“协同治理”转向、从更多地依赖人工文书传递向电子政务管理转变^⑥。政治共识的达成有利于改变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培养多元政治主体之间的“共识型”思维模式,从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影响政治共识达成的障碍因素

影响政治共识达成的障碍因素,客观上有现代社会不断分化带来的政治主体越来越多样化,以及作为政治观念的政治理想的差异和政治事实认定不同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 社会分化导致不同政治主体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化

近代以来,整个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从“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转变的过程^⑦。这主要表现在由集体意识完全淹没个人意识的传统社会,向劳动分工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分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在当今世界,社会分化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普遍性现象,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之前在多数西方国家呈逐步扩大趋势的中产阶级队伍转向分裂和分化,拉大了社会贫富分化,增加了社会矛盾^⑧。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② 杜仕菊、陈功:《转型期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发展——以服务型政党为分析视角》,《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③ 张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④ 费孝通:《费孝通与多党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⑤ 唐兴军、齐卫平:《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⑥ 张小平:《大数据时代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国际公关》2015年第5期。

⑦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91-92页。

⑧ 蒲国良:《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社会分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也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不断发生着分化,而且还出现了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新的不同阶层或群体。首先,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仍在不断分化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多样,与其达成政治共识的难度加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由于这部分群体在网络时代能够通过设置和引导公共话题,影响社会舆论,所以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这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与这部分群体达成政治共识的有效方法和路径非常必要;其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数量巨大、政治参与意愿越来越强烈,亟需探索与其达成政治共识的合适路径。目前我国非公经济数量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就业贡献率超过80%,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有7000多万^①。这部分群体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但是,他们具有“认为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对参政议政效果不满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够坚定”^②等特点,所以亟待与他们进一步达成政治共识。再次,与农民达成政治共识需要探索新路径。新形势下我国农民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政治观念方面,既有积极关心国家政治大事,关注大政方针政策的动态,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行使和践行当家作主权利和义务的“积极进取型”、也有不关心国家政治生活,顺从大众心理,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和政治意识与见解的“保守安逸”型、还有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和实施表示担忧,对国家政治生活表示忧虑,失去信心,政治观念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的“忧虑气馁”型、以及对现行政策和社会现象或者不理不问,或者盲目服从的“依赖冷漠”型^③。这使得与农民达成政治共识的传统方式已不再适用,需要根据农民政治观念的不同类型和状况,有针对性地、与时俱进地探索达成政治共识的新路径。

总之,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使得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尤为重要”^④,亟需通过思想引导,达成政治共识。

(二)政治理想差异影响政治共识的达成

政治理想可以为现实中人的思想和活动提供评价标准和心理预期模式,它主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影响不同政治主体间价值层面政治共识的达成。

一是政治理想不同影响人们对当前政治发展道路的认同。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竞争和博弈,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政治理想模式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大部分政治理想是以种种“观念”和“主义”的面貌出现,本质上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简化的范式或地图”,用其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⑤。不同政治理想的碰撞,使得政治共识达成的复杂性增加。

二是政治理想的差异导致具体政治实践路径选择不同。如中国古代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是儒家尊崇的以夏、商、周“三代”传统为代表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三代”理想模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道德层面的社会政治实践蓝图,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现实实践提供了道德规范和深层次的动力。这使得中国政治模式与西方政治模式从文化“底色”上就不相同。在近代中国,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不懈奋斗,孙中山率先打出“振兴中华”的旗号,致力于革命救国以谋求民族的复兴^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之所以适合中国,是因为它既兼顾了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从而为持续地达成政治共识提供了文化基础。

(三)政治事实认定上的差异影响政治共识达成

政治事实是指可以被人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发现和认知的政治事物或政治现象,是对政治世界所

① 本书编写组编:《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② 赵宇新、龚维斌:《析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选择和追求现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③ 郝厚军:《论新形势下加强农民思想政治观念教育的举措》,《传承》2014年第3期。

④ 本书编写组编:《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第34页。

⑤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8页。

⑥ 孙占元:《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

做的经验性认识和把握。因此,政治事实不是简单的政治事物,而是对政治事物的类属、性质、关系、状况等情况的认识,是关于政治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怎么样或不怎么样的知识^①。对政治事实的认定方式通过以下渠道影响政治共识达成:

首先,对政治事实采取孤立的、静止的或非历史的态度会影响到政治共识的达成。只有正确理解政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才能得出真理性的政治事实,从而真正地达成政治共识。要正确认识政治事实,就要避免对政治事实进行单纯地、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就曾批评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家“把应当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把应当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联系,假定为事实、事件”^②,从而得出错误的甚至被歪曲的政治事实,而且失去了对政治事实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将政治事实看作一个个孤立的独立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容易“见物不见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且还会使对政治事实的认定成为对不公正社会现象的维护。

其次,对政治事实的研究采取“价值无涉”的态度影响到政治共识的达成。政治事实分为历史政治事实和当前政治事实,由于“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因此,任何对政治事实的认定,都牵涉到一个价值立场的问题,在政治事实认定上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打着“价值无涉”的幌子,将政治价值转入了“地下”,对政治事实按照隐藏的价值立场进行了裁定,从而背离了唯物史观立场,导致政治共识难以达成。

再次,网络社会信息认定权从权威转到普通百姓影响到政治共识的达成。长期以来,对政治事实的认定、制作和发布,被看作是政府、公权力部门的特权,其中专家学者或知识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快速大众化,普通民众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普通民众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围观”强势介入到公共政治生活中,而且由于信息获取异常容易,加剧了网民对政治事实的认定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权威。弗朗西斯·福山据此称人类已经进入“后事实”世界。表现在“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挑战。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④。在这种“后事实”世界背景下,政治共识的达成尤其在西方国家面临巨大挑战。

三、政治共识达成的路径

确定了政治共识的内涵及其价值和程序两个层面的结构,分析了当前影响政治共识达成的客观因素,下面我们以中国为例探讨一下政治共识达成的具体路径。

(一)寻找和确认政治共识达成的主体

达成政治共识,一个前提条件是确定“和谁”达成政治共识,即辨别和确定所要达成政治共识的各个潜在的政治主体。这个寻找和确认政治主体的过程,借用阿尔都塞的说法,也是一个把潜在个体或群体,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传唤”成可识别的政治主体的过程^⑤。在当代中国,达成政治共识涉及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的主体,即党内主体和党外主体。一方面,党内政治共识达成主体的寻找和确认主要靠全面从严治党,具体表现为明确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责任。比如在制度治党方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专门明确了党组织的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地位,这是以党内法规的刚性规定来有意识地将党组织“传唤”成为达成党内政治共识的政治主体,党组织又担负着把普通党员“传唤”为政治共识主体的责任。另外,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展的强力反腐以及其他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措施,也是在有意识地将党员“传唤”成具有主体责任意识的更加自觉的政治共识主体;另一方面,党外政治共识达成

① 彭漪涟:《论事实——关于事实的一般涵义和特性的探讨》,《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第2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④ 弗朗西斯·福山:《“后事实”世界的兴起》,《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5期。

⑤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下),孟登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主体的寻找和确认主要靠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寻找、辨别和确认需要达成政治共识的政治主体,从而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作用。统一战线的日常工作就是将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等团体的党外代表人物纳入到统战工作中来,将新出现的党外代表人士群体如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农民工中的代表人士纳入到统一战线的沟通协商过程中。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提到的当前需要着重团结的留学人员,以及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等,就是最新寻找和确认的需要达成政治共识的政治主体。在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的统战工作领域,亟需及时将更多群体转化为有利于推动政治共识达成的政治主体。

(二)从价值层面探索达成政治共识的路径

从价值层面探索达成政治共识的路径,第一,要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在达成政治共识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教育广大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另一方面,要在党外扩大价值包容的范围。在“划出政治底线”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因为“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越大”^①,所以,要将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旗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增添力量。第二,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引领作用。“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②。第三,要重视发掘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政治共识达成的思想因素。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表达的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相统一,它为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整体思维模式支撑,塑造了中国以“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为特点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所形成的尊重民意、注重协商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共识的达成;“中和位育”思想表达了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彼此依赖、和谐相处的关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秩序观,它启示我们,要推己及人,“人己的健全的相处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共识”^③,而只有“不迁怒,不贰过”,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适应,抱着共存共荣的理念,通过“接触、交流、对话和建立共识”的磨合,才能最终达成政治共识;总之,应该发掘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在达成价值层面政治共识中的作用。

(三)从程序层面探索达成政治共识的路径

价值层面达成政治共识,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从程序层面达成政治共识解决的是“如何做”的问题。从程序层面达成政治共识,可以从党内党外两个层面入手。

党内达成政治共识的程序性路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对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首先要在党内达成政治共识。从程序方面促进党内政治共识的达成,根本的路径是严格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④。一方面,从民主角度看,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⑤,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⑥,可以为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畅通党员的意见表达渠道,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这就为党员发挥在党内事务中的主体作用提供了制度依据,有利于提升党员对党内事务决策的认同、支持和参与,从而为党内政治共识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从集中角度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的表达、党员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坚决一致。这种集中,既表现为全党思想的统一,也就是在民主基础上充分表达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经过少数服从多数程序形成决策,从而完成全体党员意志、智慧的凝聚过程;也表现为组织上的物质统一,主要是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③ 费孝通:《想起潘光旦老师的位育论》,《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④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年第15期。

⑤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5版。

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

执行决策时的步调一致^①,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为党内政治共识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思想统一的保障、物质基础的保障、组织机构的保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②。

党外达成政治共识的程序性路径,表现为以统一战线为主要平台的制度和机构的完善,具体表现为:第一,利用好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两个主渠道。政党协商深深地植根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通力合作的实践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党协商有了制度化的平台,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对现实中政党协商实践经验的总结基础上,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如《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对政党协商的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提出了宏观指导意见。然而,目前来看,政党协商也存在着“越往高层越受重视,从上往下存在受重视程度递减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党协商机制不健全、程序不规范、可操作性不强、随意性比较大”^③等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协协商主要依托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目前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度已经比较高,《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至于现实政协协商中存在的协商意识不强、重视不够、程序可操作性不强、协商过程不够民主等缺点^④,则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改进;第二,纳政治协商入决策程序。决策前先进行协商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逐渐转化为程序性制度形式,尤其是中共十七大报告确认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原则,使得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作为一项政治程序正式嵌入政府过程^⑤。下一步,在协商议题提出,健全知情明政制度,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办法方面要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第三,通过搭建学习平台达成政治共识。学习平台发挥着通过思想引导、自我教育而达成政治共识的作用。目前,《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为通过学习培训与党外代表人士达成政治共识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

The Obstacles and Ways to Achieve Political Consensus

GUO Shi-min JIANG R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consensus is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olving regional conflicts and solving the common problems of mankind. Meanwhile,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brings different ideas of political subject pluralism, political ideal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litical facts, which greatly influence whether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can be reached smoothly. In order to promote political consensus,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for and confirm the main body of political consensus, to strict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factors that are conducive to political consensu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two main channels of consultat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PPCC) and incorporat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Keywords: Political consensus; Political ideals; Political facts; Value; Procedure

[责任编辑:李春明]

① 肖纯柏:《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十八大以来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新探》,《党的文献》2014年第3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
③ 徐行、陈永国:《政党协商中参政党的主体性困境探究》,《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④ 刘俊杰:《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研究》,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3-167页。
⑤ 胡筱秀:《人民政协制度功能变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